

鏡海叢報

澳門基金會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聯合出版

ISBN 7-80618-753-7



9 787806 187531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鏡海叢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編.一影印
本.一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7

ISBN 7-80618-753-7

I.鏡... II.①澳...②上... III.期刊-中國-清
后期-影印本 IV.Z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38058 號

特約編輯 費成康

責任編輯 方小芬

裝幀設計 沈 陽

鏡海叢報(影印本)

澳門基金會(澳門民國大馬路6號)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聯合出版發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號)

上海市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9.25 插頁 5 字數 810000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7-80618-753-7/C·101

定價:120 元

《鏡海叢報》序

姜義華

澳門是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發祥地。一八二二年以葡人為主的立憲派在澳門創辦的《蜜蜂華報》，在巴波沙少校主持下，配合他們所發動的民主運動，積極鼓吹立憲主張，抨擊貴族保守派，成為中國境內第一份近代報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葡萄牙人在澳門又陸續創辦了《澳門鈔報》、《帝國澳門人》、《澳門政府公報》等六種報刊。這些報刊俱用葡文出版，中國人很少閱讀。一八三九年，原在廣州出版的《廣東紀事報》與《廣州周報》移至澳門，用英文出版，被譯為《澳門紀事報》、《澳門新聞紙》。澳門成了當時中西信息交匯之所。林則徐一八四一年四月在給將接替他主持廣州防務的奕山的信中特別強調這一點：「其澳門地方，華夷雜處，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干穩實之人，暗中坐探，則夷情虛實自可先得。」他要求奕山應分外注意澳門報刊：「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即行印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內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為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一〕}林則徐本人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因為他剛到廣東，就組織力量翻譯在澳門出版的外文報刊，整理編選成包括《論中國》、《論茶葉》、《論禁烟》、《論用兵》、《論各國夷情》等專題的《澳門月報》。這些過去聞所未聞的信息，使他大大擴展了視野，開始對外部世界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識，為他同外國殖民侵略者進行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香港、上海一大批報刊崛起，逐漸取代了澳門新聞中心的地位。因此，許多中國新聞事業史或中國近代報刊史的研究者心目中，澳門報刊的地位逐漸消失。對於近代澳門曾經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報

刊，幾乎所有研究新聞發展史的著作都語焉不詳，原因之一，這些報刊搜尋不易，且長時間缺乏有心人下功夫發掘與介紹。

一九九七年，當《知新報》創刊百周年之際，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與澳門基金會合作，影印了幾乎全帙《知新報》。澳門還專門舉行了《知新報》創刊百周年學術研討會。通過《知新報》，人們對澳門維新變法運動及其在全國維新運動中的地位，有了新的了解。

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與澳門基金會再度合作，影印了這部《鏡海叢報》。

《鏡海叢報》，幾乎所有近代新聞事業史著作都未提及。八十年代以來，研究孫中山生平與思想者開始注意到這一文獻，但因查閱原刊不易，轉述者居多。以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為例，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五年多次引述《鏡海叢報》，但多為轉引，主要引自梅士敏《孫中山澳門行醫史料新探》（《香山報·孫中山先生誕辰一二一周年紀念專刊》）及《澳門日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表的《創辦〈鏡海叢報〉與飛南第結友誼》二文。^①《孫中山年譜長編》集合嶺南研究孫中山的衆多專家經多年精心撰著方才成書，這部分資料仍不得不轉引，足證閱讀《鏡海叢報》原件之難。

多年來，涉及《鏡海叢報》的文章和書籍大多認為，該刊是孫中山早年在澳門活動時為宣傳革命，在葡人好友飛南第支持下，兩人合作創辦的中文周刊，孫中山是該刊匿名的編輯和主筆。

既然《鏡海叢報》係由孫中山主辦，那當然引起海內外孫中山研究者高度關注。前幾年，我趁在澳門訪問與參加學術研討會之機，專門去何東圖書館查閱了那里所收藏的《鏡海叢報》。一方面，因看到了與孫中山直接相關的文章、報道、廣告而高興，另一方面，又對該刊是否果真為孫中山主辦產生懷疑。可惜的是何東圖書館只收藏了一部分《鏡海叢報》的復印件，對這一刊物的全貌尚難了解，也就難以下結論。

費成康與吳志良兩位博士都是有心人，他們都希望找到《鏡海叢報》全帙，提供給世人，供人們深入地進行研究。經過多年辛勞和努力，現在找到《鏡海叢報》第一年第一號一部分及第二十、二十三、二十四號，第二年第十號至五十一號，第三年第一號至第二十三號。尚缺第一年第一號中的第三與第四兩頁，這一年的第二號至第十九號，第二十一與二十二號，第二十五號至第五十一號，第二年第一號至第九號。在一八九三年該刊葡文版即可譯作《澳門回聲報》的ECHO MACAENSE各號中，有不少與孫中山相關的廣告頁。為了及早將這些文獻提供給研究者，同時，希望更多的有心人由此引起興趣，共同尋找現尚未曾找到的各號《鏡海叢報》，經反復斟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與澳門基金會決定將目前已經搜集到的各號與葡文版中一部分廣告頁先行影印出版。

現在所搜尋到的六十九號《鏡海叢報》，為已知一百二十五號《鏡海叢報》一半略多一些。以現有的《鏡海叢報》推定全帙，顯然並不適合。但是，從影印的各號《鏡海叢報》，仍可對這一刊物獲得遠較過去具體而準確的認識。

《鏡海叢報》以十六開張印刷，每號六頁，鉛字排印，每號約可容納一萬餘字。六頁版面大體上第一頁為目錄、代派《鏡海叢報》處所地址、本報告白，然後為論說；第二頁為論說續編及「中外報」摘；第三頁為中外報摘續編，包含上諭、奏摺等；第四頁通常同第三頁；第五頁為「省港報」摘，摘登廣州與香港報紙消息；第六頁為「本澳新聞」。後來，將省港報摘并入中外報摘之中，不單獨列出，第二頁至第五頁基本上是國內外各類新聞。

每號一萬多字，沒有標點，每周一號，所包含的信息量是相當大的。每號有關中外新聞，不下百條，長新聞較多時也有數十條。

由於一八九三年僅存七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及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四號，一八九四年一月至九月十九日各號俱無，其中內容不清楚。從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各號，保存完整，從中可以清楚看到，《鏡海叢報》給人們提供了國內國際大量有價值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信息，給人們研究當時中國政局、對外關係，研究廣東、香港、澳門及其他地區的經濟、貿易、社會風俗，了解各國情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從《鏡海叢報》第二年第十號開始，幾乎所有各號都以相當多的篇幅報道中日甲午戰爭陸戰、海戰以及其後議和、簽約、臺灣人民奮起反對割讓的斗争等幾乎所有重大事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去譯述外電、外報外，還有目擊者或親歷者提供的獨家消息。論述中有不少篇也針對這場戰爭而發。未仔細核對，粗粗瀏覽一下，已發現其中有不少事實，為其他記載所未錄，或僅簡略提到。

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及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簽訂，激使維新變法迅速發展為社會思潮與政治運動。這一歷史變遷，在《鏡海叢報》也有鮮明的反映。《鏡海叢報》的多篇論述，表明了澳門本地維新思想的發展歷程；多篇報道，反映了北京及其他地方維新思想迅速高漲的情況。《鏡海叢報》不僅及時發表了康有為的《強學會序》，而且刊載了呼吁變法的多篇志士上書，為了解一八九五年底以前維新變法發展的深度與廣度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第一手資料。

《鏡海叢報》有相當豐富的經濟資料，如第二年第十九號與第二十一號所刊登的《光緒十九年海關稅務司報稱廣州口岸華洋貿易情形》，第二十二號所刊登的《光緒十九年九龍關華洋貿易形勢略論》，第三十號所刊登的《綜論甲午

年上海市情》等，內容翔實。第四十二號及其後，多次報道時疫在廣東、香港、澳門的情況，並發表長篇相關論述。這些事件為研究者一向未曾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鏡海叢報》有關科舉考試的大量報道，包括各省考試試題、會試題目、中式名單、武場題名等。第二年第十號各省鄉試首題，山西為《或問子產一章》，江西為《父母在不遠游必有方》，河南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而過其行明乎郊社之禮》，……。第二年第三十九號刊會試題目，二場：《易：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書：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詩：如山之苞如川之流》，《春秋：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渾文公十有二年》，《禮記：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在甲午海戰陸戰連遭敗績、舉國震動的嚴峻形勢下，吸引着廣大青年士人的鄉試與會試的題目與現實如此隔膜，中國焉得不敗？第二年第十一號報導：「金陵南關某生第三場在卷面大書七律云：八篇鈔襲舊文章，依舊頭銜上短牆；事業由來重銅綠，功名從此誤騰黃；千金幾便捐三命，五試誰憐貼四場；大笑一聲歸去也，免教謔寫累人忙。」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於這種考試制度是多麼不滿與無奈。

『本澳新聞』以及澳門當局發布的許多公文，對於了解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五年的澳門，提供了大量生動的素材。第二年第十五號刊登的澳門保產會緣起、章程表明，為保障澳門貧寒人家母安子育而創立的保產會，給孕婦、產婦提供膏丹丸藥及姜醋柴米，以作調劑，為他處所少見。第二年第二十六號所刊沙岡地段章程及居民遷徙別地所有民居墳墓一律倒拆鋤挖一事的爭執情況，為澄清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證據。通過這些材料，可以相當形象地復原澳門當時的社會生態。

《鏡海叢報》影響沒有局限於澳門一隅。從該報代派處所的分布可以看出，除澳門、香山外，廣州、佛山、香港、新加坡、福州、廈門、上海、北京、橫濱、馬尼拉、舊金山、里斯本等地都有特約的派報處。希望最終能從這些地方尋找到所缺失的各號。

最後，是《鏡海叢報》與孫中山關係問題。這一問題費成康已有專門論述，《鏡海叢報》中有哪些和孫中山相關的文獻，費成康已一一列舉，這裡不再重複。《鏡海叢報》從第二年起，一直由貴州人王真慶任主筆，筆名為「黔中味味生」或「味味生」，另一撰寫了多篇論述的是「賁禹高陽少笙氏」或「少笙氏」，他們都不是孫中山，費成康已辨析得非常清楚。問題是《鏡海叢報》第一年，特別是在最初幾號，孫中山參與的程度如何，尚可進一步考訂。第一號除「叢報主人飛南第」署名的《創辦鏡海叢報條例利益布啟》外，尚有一篇論述《振興澳門商務論》，由於缺三、四頁，這篇文章不完整，也無署名，作者是誰，值得探究。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第二十號論述《嘉言》，末署「黔中味味生」

附識」，說明王真慶這時已負責編務，這篇文章全錄戶部掌印給事中洪良品奏摺，再加附評，是王真慶所為，當無疑義。但是，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第二十三號論述為《照譯西論》，批評鏡湖醫院「實無益於貧病，而徒有其名」，專門表彰「該院惟自孫醫生入內，自籌經費，開創西醫局，益人甚多」云云，文末署「此由本次之西洋報，倩托名手以繹登，操觚政者不與聞也」。該文的原文是葡文，其作者當是孫中山的葡萄牙朋友。文章的部份內容，如整頓該醫院的四條措施等，很可能由孫中山提供。而該文的譯者也可能即是孫中山本人，他和作者可以英語為工作語言。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二十四號論述亦為《照譯西論》，要求「中國官大開禁網，準令民人出洋」，以免「外國之人，有業無工，荒蕪可惜；中國之人，有身無業，閑散堪嗟」，末亦署「以上係譯西論」，譯者甚至作者亦可能為孫中山。一八九四年九月以後各期，孫中山早已離開澳門，不可能參與《鏡海叢報》了。如能找到第一年第二十五號至五十一號各期，當可對於孫中山與《鏡海叢報》的關係，作出更為準確的考訂。

順便說一下，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六日出版的《鏡海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刊登的《是日邱言》，論者多以為是飛南第寫了前面一大段按語，後面全錄孫中山所撰的《農學序》。這段按語全文如下：

香山人孫文，字逸仙，少從亞美利加洲游學，習知外洋事態、語言文字，并精西醫，篤信西教。壯而還息鄉邦，尚不通漢人文，苦學年餘，遂能讀馬、班書，撰述所學，蓋亦聰穎絕倫之士也。惟是所志甚大殊，皆楚項藉學劍學書之意。期於高遠，忽於細微，緣是而所就事，多不克裏厥成。往曾上書京朝，造請張香帥、李傅相，皆「未」能如其意願。退而薄游歐美，結交俊杰。今春返居香港，溯長江，窮五嶺，考察地利民生之益，創為農學會，布書集事，欲建無窮之利。嗚呼！今時正患無才，猶患有才而無以用，未某落寞，此等之憂，恐較強鄰而更甚。昔武曌讀駱賓王檄而顧問宰相，深嘆其才之不用。今茲伴食中書，亦能明斯故耶？動曰求人才，亦安在哉？特錄其農學序如左。

這一段可視為孫中山小傳及《農學序》前言，顯然不可能是飛南第撰寫。飛南第撰文，是他自己口述，由味味生王真慶執筆成文。孫中山廣州起義失敗後，匆匆逃到澳門，隱匿於飛南第寓所，再在飛南第幫助下逃往香港。這段小傳，與其說是飛南第所撰，不如說孫中山自撰更適宜，當然是以第三者的口吻。

《鏡海叢報》內容甚為豐富，這篇序言只是作一個引子。已有研究者就《蜜蜂華報》寫出了一部專著；《鏡海叢

報》研究也可以成為碩士乃至博士論文的題目，希望早一點看到研究《鏡海叢報》的學術專著問世。

注釋：

- (一)《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一〇一頁。
- (二)《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版，第六十三至七十一頁。

孫中山和《鏡海叢報》

費成康

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除少數澳門知識界人士外，中國的學術界尚不知在十九世紀末的澳門出現過一份《鏡海叢報》。由於這一刊物與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早期活動有密切關係，因而該刊物已越來越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

(一)

《鏡海叢報》創刊於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起初是每星期二後改為星期三出版的周刊。該叢報分為每號四頁的葡文版和每號六頁的中文版，二者的內容有較大的差異。葡文版的刊名為 ECHO MACAENSE，直譯為《澳門回聲報》，不過，直到一八九四年，這一葡文刊名下一直有中文「鏡海叢報」四字，以顯示兩種版本的特殊聯係。中文版終刊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葡文版還延續了多年。該叢報的報主是澳門的土生葡人飛南第。他曾任在香港的法院中任翻譯，與正在香港學醫的孫中山結識，並成為摯友。在下文中，為了便於敘述，將稱中文版為《鏡海叢報》，葡文版為《鏡海叢報》葡文版。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鏡海叢報》葡文版大體上被保存了下來，但能夠找到的《鏡海叢報》總共只有六十九號，除創刊號等數號外，絕大多數都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九月以後。見存的《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載有不少關於孫中山早期活動的文字，其中包括《照譯西論》、《是日邱言》兩篇文章，《鏡湖耀彩》、《無遠弗屆》、《謠言四起》、《要電匯登》、《事

必再發《五則新聞》、《神乎其技》、《春滿鏡湖》、《中西聖藥》以及兩則《聲明告白》共五則告白。此外，若干篇沒有署名或署某些筆名的文章等是否出自孫中山之手，尚有待日後的研究。至今缺失的中文版共達五十六號，它們出版於一八九三年七月至一八九四年九月，其中很長一段時間正是孫中山在澳門活動的時期，因而在缺失的部份中必定還會有很多關於孫中山的資料。值得指出的是，雖然《鏡海叢報》首頁的目錄顯示，它們的最後部份多是「各行告白」，但在實際上它們的末尾往往沒有任何告白。因此，有些告白似乎是另附在六頁正文之後。而在一八九三年六月至一八九四年二月的葡文版第四頁上，則有不少中文告白。由於葡文版的讀者主要是當地的葡人，他們幾乎都不能閱讀中文，這批中國人士尚且能在葡文版上刊出告白，可以推測他們當同時在中文版上刊出這些告白。目前，我們所見到的孫中山本人的或關於孫中山的告白均刊登於葡文版，似乎可以推測在同期的中文版上也應有相同的告白，只是它們未被保存下來。

見存的《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上所載錄的有關孫中山的資料，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記載了孫中山高超的醫術。在《鏡海叢報》創刊號上，就介紹了孫中山手到病除的六個醫案：「陳宇，香山人，六十一歲，患沙淋八年矣，辛楚殊常。頃在醫院為孫醫生割治，旬日便痊，精健倍昔。又西洋婦某，胎產不下，延孫醫治之，母子皆全。又賣面食人某，腎囊大如斗，孫醫用針刺去其水，行走如常。又大隆紙店兩伴，誤為毒藥水焚炙心胸、頭面，勢甚危殆，孫醫用藥敷之，旬日就愈。又某客棧之伴，與妻口角，妻於夜半吞洋烟求死，次晨八點鐘始有人指到孫館，如法救之，亦慶更生。又港之安撫署書寫人尤其棟，患吐血症多年不瘳，華醫束手，親造孫醫求治，一月奏效。」^(一)駐守前山寨的廣州海防同知魏桓則多次刊登告白，通過他親身的經歷，稱譽孫中山的醫術是「神乎其技」：他患痔疾廿餘年，「其苦已甚，其累日深」。友人何穗田「力陳孫逸仙之人品學問，及所習歐洲醫法」；他也「久聞孫逸仙之名，亦知其醫法，無論內外奇難雜症，莫不應手回春，奏效神速，且非以此謀利者」。孫中山在診視後只醫治了七天，「其痔遂脫，毫無他害」。於是，「家內男女老幼、上下人等亦皆信之不疑，請其醫治，或十數年之肝風，或數十年之腦患，或六十餘歲之咯血，均各奏效神速」。^(二)此外，他還在鏡湖醫院為很多貧民做了外科手術，「割愈」了一批患沙淋、肉瘤的病人。這些事實表明，孫中山精於外科、內科、產科等，常常妙手回春，故而當時的人們才會稱他為「大國手」。

第二，記載了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活動。《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的文字指出，孫中山在澳門有寫字樓和中西藥局。這一寫字樓是孫中山的診所，即是位於仁慈堂右街、當時人們所說的「孫醫館」。孫中山借款開設的中西藥局位於草堆街，該藥局既出售中藥，也出售西藥：「本局揀選中西地道良藥，各按中西制法分配成方。中藥則膏、丹、丸、

散，色色俱備，并擇上品藥料監工督制；每日所發湯劑，皆係鮮明飲片；參耆桂術，不惜重資購儲極品，以待士商惠顧，冀為傳播。所制西藥，早已功效昭昭，遍聞遠近，無煩贅述焉。^(三)同時，經澳門、香山各界人士及檀香山華僑的捐助，孫中山在鏡湖醫院內創設西醫局，每天為貧苦的居民贈醫贈藥。起初孫中山每天贈藥一百五十人，後限於經費，改為一百人。從一八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起，澳門著名的紳商盧焯之等人又多次刊登告白，其中開列了他們代孫中山訂定的各項門診及出診的時間以及收費的標準：每日早晨十時至十二時，只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早晨七時至九時，在中西藥局看病，每位病人交醫金貳毫。下午一時至三時，在寫字樓看病，每位病人交醫金壹元。三時後出門就診，凡住本澳街道者，交醫金貳元；住在各鄉市鎮者，根據遠近來酌定醫金。如係延往外地診病，每日交醫金叁拾元。至於難產，吞服毒藥，補崩口、崩耳，割眼膜，以及各種奇難怪症，均根據病人的貧富及病情的輕重來酌議醫金。^(四)可見，孫中山每天七時起就開始門診，醫務工作十分繁忙；他的收入也必定相當可觀，可為他在反駁陶成章時所說的他「賣藥行醫每年所得亦不止萬餘元」之說提供佐證。^(五)

第三，記載了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起義的部分情況。刊載在《鏡海叢報》上的新聞表明，廣州起義的消息事先洩漏。香港的中外文報刊曾多次刊登有關新聞：「數月之前，已有人說港地有等匪徒，擬變皇清為民主，運械制炸，結黨聯約，將有風起雲變，席卷囊括之勢」，香港警方也已「密為潛查」。廣東各級地方官員大多有所耳聞，但他們「非笑報語之妄，不以為意」；即畏陳說之難，難於啟達。兩廣總督譚鍾麟在獲悉後「亦笑為妄」。^(六)正是由於清朝官員的昏庸，起義才未被先期扼殺。刊登在《鏡海叢報》上的新聞也報道了起義發動時部份起義人員自香港潛入廣州的情況：「港中初十日（十月二十七日）晚，有數十人附搭火船，前赴省城。巡役見其形迹可疑，詢以往省何故，則言將赴安勇招募。其中有自言被人誘去者。巡役擬將扣留，及搜各人身上，均無挾帶槍刀，始任登輪而去」。^(七)這些新聞還記述了起義被鎮壓的一些情況：十月二十六日，巡防官兵「查得省垣雙門底王家祠內雲岡別墅有孫文即孫逸仙在內引誘匪徒，運籌畫策」，即前往緝捕，「先經逃去，即拿匪黨程準、陸號東二名。又在南關咸蝦欄李公館拿獲三匪」。此屋是「崇垣大厦，能容千人，聞前兩日有數十人在屋內團聚，續因風聲泄漏，先被逃去」。隨後，香港「保安」號客輪駛抵廣州，船上搭有「匪黨四百餘人」，官軍「出隊截捕，已陸續散去，只獲得四十餘人」，內有「頭目」朱貴全、邱四。後據朱、邱二人所供，在該輪所運的木桶里查獲短槍、子彈一批。^(八)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報道孫逸仙「謀反」的同時，《鏡海叢報》刊出了頭版文章《是日邱言》，其中轉載了孫中山撰寫的《農學會序》，并介紹了孫中山的經歷，稱譽他是「聰穎絕倫之士」，是項羽式的人物，并感慨當局者不能任用他這樣的人才，^(九)從而體現了該叢報對孫中山的態度。

《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刊載的有關孫中山的有些資料，如孫中山的上述醫案和在澳門行醫情況，是任何其他史料沒有載錄過的。孫中山本人及他的一些同志都對廣州起義的經過作過回顧，但《鏡海叢報》的記載也提供了一些過去未為人知的細節。《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確定是很有價值的。

(一)

由於缺乏原始資料，以往對於孫中山早期活動的記述，多依據有關人士多年後的回憶，因而難免會與事實有所出入。除關於廣州起義的報道外，《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上涉及孫中山的中文文字，正在澳門的孫中山必定閱讀過，有些即出自他的手筆，因此都是完全可信的。依據這些文字以及該叢報的其他文章，可以訂正以往有關回憶的一些誤差。

目前，見存的孫中山最早的著作，是撰寫於一八九〇年的《上鄭藻如書》。據說該文最初發表於一八九二年的澳門報紙。^{〔七〕}然而，《鏡海叢報》的不少文章一再指出，該叢報是幾百年來澳門的第一家中文報刊：「澳門數百年來，僅僅有一華報」。^{〔八〕}該叢報「開三百年未開之局，發千萬人欲發之情」。^{〔九〕}「澳門自三百餘年以來，今始有《鏡海叢報》」。^{〔十〕}該叢報主飛南第是土生葡人，好幾代祖先都在澳門經營印刷業，如果在一八九二年即該叢報創刊的前一年當地有過其他中文報刊，他不可能不知情。何況該叢報的主筆王真慶結怨甚衆，如果他係妄稱自己是當地中文報刊的開山鼻祖，不啻是給敵對者制造話柄，必定會遭到他們的揭露、抨擊和嘲弄。因此，《鏡海叢報》是澳門首份中文報刊之說當屬可信，一八九二年時當地尚無中文報刊，孫中山的《上鄭藻如書》不可能在此時發表於澳門的報刊之上。現存的《鏡海叢報》上載有數份給達官貴人的上書，孫中山與該叢報又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如果《上鄭藻如書》確實於一八九二年左右首先在澳門的報紙上刊出，那麼就應是刊登於至今缺失了的數十號《鏡海叢報》之上。

孫中山於一八九二年七月下旬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後不久，便至澳門懸壺濟世。據馮自由《革命逸史》的記載，在此期間孫中山「居澳半載」。^{〔十四〕}於是，研究者們根據這一記述，大多認為孫中山在澳門活動的時間為半年左右，到一八九三年春即轉往廣州行醫。然而，刊載於《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的文章、告白清楚地表明，孫中山在澳門活動的時間長達一年多。孫中山於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向澳門鏡湖醫院借款開辦中西藥局的借據猶在，這說明孫

中山在澳門的活動始於這一年的下半年或年底。一八九三年七月，廣州海防同知魏恒在《鏡海叢報》葡文版刊出的告白中寫道，他於「去歲臘月封篆後延請孫逸仙診視」，此後合家上下都請孫中山治病，^{〔十五〕}這表明一八九三年初孫中山也在澳門行醫。同一期的《鏡海叢報》葡文版刊出了孫中山的告白，其中表明他的寫字樓和中西藥局正在正常運作。^{〔十六〕}出現於同年九月葡文版的告白《春滿鏡湖》又指出，至此時孫中山已在鏡湖醫院贈醫數月。由於孫中山向鏡湖醫院所借的二千餘元本金需在五年後還清，每月一元的利息需以代辦的西藥來償還，孫中山又承諾將在該醫院「自願贈醫」，因而孫中山也決不可能在這一年的春末夏初至他處去挂牌行醫。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同時刊登在《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的文章指明，此時孫中山仍在鏡湖醫院贈醫贈藥，並與該醫院的值班、司事和中醫發生了衝突。^{〔十七〕}這一記載表明，除短期離澳外，直到一八九三年底孫中山一直在澳門行醫。從一八九三年八月一日起，《鏡海叢報》葡文版上幾乎每號都刊有中西藥局的中文廣告。中西藥局的最後一次廣告刊登於一八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刊登商業廣告是要經濟代價的，孫中山不可能在結束澳門的業務後繼續在當地刊登此類廣告，因此，可以推斷，孫中山離開澳門的時間當在一八九四年一月前後。可見，有關孫中山「居澳半載」的記述是不正確的，孫中山在澳門的行醫生涯長達一年多時間。

以往的研究者參照《革命逸史》的記載，認為孫中山於一八九三年在廣州設立東西藥局，一八九四年一月孫中山「因廣州東西藥局營業失敗，遂回翠亨鄉與家人團聚十餘日，始赴香港」。^{〔十八〕}《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的文章充分地顯示，一八九三年孫中山一直在澳門活動，到一八九四年一月前後他才離開澳門。東西藥局在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廣州《中西日報》上刊登的廣告也證明了這種情況：「本局敦請大醫生孫君逸仙來省濟世，舊歲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謹擇月之初十日（二月十五日）開辦」。可見，孫中山應東西藥局之請前往廣州是在這一年的正月初一（二月五日）以前，在回鄉過年後他返回廣州繼續開業。因此，孫中山在廣州的行醫活動並非終結於一八九四年一月，而恰恰是在此時肇始。

目前，有些研究者還根據馮自由的有關記載，認為孫中山於一八九三年「冬初，開會議於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抗風軒」，並首次提議成立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的革命團體。這一記述也建築在孫中山於一八九三年即在廣州行醫的基礎之上。也是根據馮自由的記載，可知孫中山在澳門期間「時欲物色熱心同志，如鄭士良、陳少白其人者，杳不可得」。到了在廣州行醫期間，他「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質甫、程耀宸諸人」，而在抗

風軒聚會的革命同志中就有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魏友琴等人。^{〔十九〕}可見，孫中山要到行醫廣州後才發展了一批革命同志，然後才有倡建革命團體之議。由於孫中山於一八九四年初才到廣州行醫，因此孫中山的上述革命活動當在冬末，也即一八九四年初。

根據孫中山本人的回憶，孫中山離開澳門的原因，是澳門的葡萄牙醫生妒嫉他營業日盛，以「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於是，孫中山只得離開澳門。^{〔二〇〕}《鏡海叢報》上的文章則顯示，孫中山離開澳門的原因，與他和鏡湖醫院值事、司事和中醫的衝突應有某些關係。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鏡海叢報》的首頁刊出了題為《照譯西論》的譯文，其原文是葡文，刊登在同號的葡文版上。該文寫道，「鏡湖醫院者，實無益於貧病，而徒有其名者」。其原因在於該院的中醫「扣其學則無有，考其出處則賣菜、擔水者或亦有之。其席位則三月一易。其請醫則不計其能醫人與否，惟視推薦值事情而定」。該院的司事對於沒有「值事情面所薦」的病人，「雖危急亦不收」他們入院，「有人薦則不病亦收以養之」。該院多名中醫每日只醫十餘人，而一年開銷六七千元經費，孫中山自籌經費創設的西醫局每日醫一百數十人，「其功十倍，乃令一人擔持其任，亦殊失公道矣」。而孫中山讓重症病人住院手術之舉，又因「該院司事、醫生、值事等所忌」而被迫停辦。這篇文章宣稱，「欲整頓該院，其法有四」：其一，「院內的中醫需通過考試後」方準入院醫人；其二，盡行撤換原來的司事，由「各善士揀選實力辦事、有心愛人之士」來接任；其三，「院內經費當分一半」，作為西醫的經費；其四，病人入院，不講人情，「只論其症應否入院醫治」。^{〔二一〕}鏡湖醫院原來只有中醫，病人為當地的中國居民。這篇由葡人執筆、揭露該醫院弊病並為孫中山鳴不平的文章，顯然體現了孫中山對該醫院現狀的不滿以及整頓該醫院的主張。該文發表後，孫中山與該醫院值事、司事和中醫的衝突必定更加尖銳。大約在一個月後，孫中山便被迫離開澳門。值得注意的是，該文的作者，一位葡萄牙人士，在此時尚未提及葡籍醫生排擠孫中山的狀況，而孫中山自己經營着中西藥局，也不必為他的藥方無處配藥而擔憂，何況在不久後有位只有「英人之醫照」的西醫劉香甫又在鏡湖醫院「贈診病衆」，^{〔二二〕}可見，葡籍醫生的排擠，只構成孫中山離開澳門的部份原因，而與鏡湖醫院有關人士的衝突當是他離去的又一重原由。

顯然，依據《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的記載，可對一八九二年下半年至一八九四年初有關孫中山早期活動的回憶，作出較為可靠的校正。

對於孫中山與《鏡海叢報》的關係，近年來也有一些誤解。最大的誤解，是有些研究者，直至孫中山的後裔，都認為孫中山是《鏡海叢報》的主筆，並主理其編務。有的研究者還斷言，該叢報主筆的筆名「黔中味味生」，即是孫中山早期的筆名。然而，在仔細查閱《鏡海叢報》後，就可以看到孫中山決不是該叢報的主筆，同時也不可能主理該叢報的編務。

《鏡海叢報》上的一些文章明確地指出，該叢報的主筆是貴州人王真慶，又作王孟琴，「黔中味味生」是他的筆名。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六日的《鏡海叢報》上，有份「叢報局主稿王真慶」的告白，其中宣稱他將在叢報局內附設訓課弟侄的書塾。^(三三)刊登於同年十二月四日的新聞《兩為存志》指出，「澳門《鏡海叢報》局主筆為黔人王君孟琴」。^(三四)該叢報首版的政論，大多署「黔中味味生」之名。除殘缺的、因而未能確認誰是主筆的創刊號外，見存的最早出版的一八九三年第二十號叢報即由「黔中味味生」主筆政。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孫中山因廣州起義失敗而亡命海外之後，「黔中味味生」之名仍出現於《鏡海叢報》。特別應指出的是，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鏡海叢報》的主筆「味味生」曾被仇家投擲了硝鎗水，以致臥病多日，而孫中山則從未遭遇過這樣的襲擊。在孫中山已抵達海外的一八九五年十二月，該主筆又因開罪於澳門總督等人而被判處三天監禁，嘗到了鐵窗風味。這些情況充分地表明，孫中山不是《鏡海叢報》的主筆，「黔中味味生」也不是他的筆名。至於孫中山主持該叢報編務之說，也未能從見存的《鏡海叢報》及其葡文版以及其他史料中找到任何佐證，何況孫中山是到澳門來行醫的，每天七時起就要開始門診；一八九四年一月後他便離開澳門，有時還遠涉重洋，因而也不可能數百里外直至萬里之外兼理澳門一份周刊的編務。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被仇家淋澆了硝鎗水的王真慶一度無法再事筆硯。在此後一段時間里，《鏡海叢報》的多篇政論出自「賈禹高陽少笙氏」之手。此時，孫中山正在廣州、香港籌劃武裝起義，也有重抵澳門的可能，而「笙」與「孫」發音近似，因此，「少笙氏」是否是孫中山的筆名，倒是個不應忽略的問題。由於《鏡海叢報》在提及孫中山時都指出他是香山人，孫氏的郡望則是富陽等地，因而這個「少笙氏」的籍貫、郡望都與孫中山不符。特別是他的文章不符合孫中山的思想和情況。這時，孫中山已在策動推翻清皇朝的武裝革命，而「少笙氏」的文章則稱清朝為「聖清」、「我朝」。他的有些文字還頗為香艷，如在《澳地後盛論》中就有此類介紹澳門風月場所的文字：「惡客

少年，往往使酒罵座，非憐香而惜玉，惟煮鶴而焚琴。其小者既笞鳳而鞭鸞，其甚者且摧花而折柳。」^(二五)這樣的文字決不可能出自正在領導革命的孫中山之手。可見，即便在王真慶抱病期間，孫中山也沒有臨時代理過《鏡海叢報》的主筆。

在一八九五年底孫中山亡命海外後，《鏡海叢報》也旋即終刊，因此，人們容易產生孫中山的離去導致該叢報終結的聯想。在事實上，該叢報的終結與孫中山無關，而是因其主筆王真慶開罪了澳葡當局。王真慶雖是個中國傳統的文人，但因久居香港、澳門，已受西方觀念影響，以為報社有言論自由，便以「剛正自持，懲惡鋤奸」^(二六)為該叢報的宗旨。正如其同事指出的那樣，「王君語好直罵，絕無顧忌」。^(二七)然而，當時的澳門并非他臆想的言論自由的地方。他對廣東地區中國官員和澳門紳商的抨擊，引起了他們的憤怒和報復。除了向報館投送匿名的恐嚇信外，他們還雇人向他投擲了硝鎗水，不過，在澳門總督高士德與其政敵激烈的爭斗中，兩種文本的《鏡海叢報》都堅定地支持總督，總督也一直是《鏡海叢報》幕後的支持者，因此，有些報刊曾抨擊《鏡海叢報》「孤峰獨聳，異常峻惡」，但却「常以香花薰養」澳門總督。^(二八)這種狀況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發生了變化。這一月中旬，因蓮溪廟奠基，當地的中國紳商舉辦演賽大會。廣州、香港的歹徒紛紛入澳，致使當地發生了多宗搶劫案。王真慶遂在本澳新聞中指責華政司梁詔、總督高士德：「華政良（梁）詔、總督高某，何為混貪熱鬧，而許華商之請」。澳葡當局以「混」、「貪」、「某」三字，「大有鄙玩呵斥之意」，即傳詢叢報主筆。飛南第聞訊後急忙到高士德處斡旋，因而次日華政司官員只是將王真慶教訓了一番。此後，王真慶雖在文章中稱譽「澳督大度，華政溫和」，但又自比北魏時的高允，「以史獲罪」。^(二九)有些仇視王真慶的華人便謊稱「高允為三國時奸臣」，王真慶係以高允「暗指澳督，以切其姓」。高士德十分惱怒，於是，在十一月三十日王真慶遂被判三天監禁。事後，當地有些紳商宣稱此事「大快人心」，王真慶也灰溜溜地有「焚筆弃硯，歸釣河干」之意。^(三〇)在這種情況下，《鏡海叢報》旋即終刊，當是很自然的結局。

飛南第是孫中山的好友，但他并未延請孫中山出任《鏡海叢報》的主筆，其中的原因是不難理解的。孫中山畢業於香港的醫學院，來到澳門後借款開設了中西藥局，醫務工作十分繁忙，再要兼任一份周報的主筆或主其編務，當然有相當的困難。而此時的一些中國文人還認為孫中山的中文根底并不厚實，因而該叢報在介紹孫中山事迹時稱孫中山少年時「尚不通漢人文，苦學年餘，遂能讀馬、班書」。^(三一)因此，他們不會認為孫中山是擔任主筆的合適人選。不過，可以確認的是，孫中山必定參與了《鏡海叢報》的一些工作。《鏡海叢報》的創刊號便指出，仁慈堂右街的孫醫館和草堆街的中西藥局，均是該叢報的訂閱處。《鏡海叢報》的創刊號直至其終刊號，又標明該叢報在香港縣治所在